

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我們都在美國大學任教，而在每年的個人「學術成果評估」中，翻譯——不管翻譯的是多麼重要的文字，也不管譯得多麼好（而這是極不容易的）——都不會被視為「原創性」的治學行為。然而，好的譯著的產生卻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說，是要慢慢地「磨」出來的。（據說當年傅雷譯書便以每天 500 字為限，以「保證質量」。）這幾年，又恰逢我們從弗吉尼亞大學轉往康奈爾大學任教，除了平常的教學和研究外，陳兼還承擔了極為繁複又牽扯到複雜人事關係的行政工作，實在難有時間用於翻譯書上。於是，翻譯此書的事一拖再拖，直到 2009 年我們都從康奈爾大學學術休假、在倫敦經濟學院從事研究時，才有了一段可以相對集中用於翻譯此書的時間，完成了全書的初譯稿。這兩年又斷斷續續地對譯稿再做反複修改，才完成了現在這一稿。我們的翻譯水平其實並不覺得比別人高，只是做這件事時不敢草率行事而已，雖不敢說處處「嘔心瀝血」，但確實是字斟句酌。（對孔飛力的著作，尤其需要如此！）

這些年來，每當陳兼對認識他的美國同事和同行們提起他打算翻譯孔飛力這本書時，他們的反應都是「為甚麼？」。哈佛的兩位資深教授便曾問過陳兼：「你自己有那麼多要緊的事情要做，為甚麼要把時間放在別人著作的翻譯上？」

確實，表面上來看，我們自己的研究興趣和題目同孔飛力似乎很不相同。多年來，陳兼主要從事國際冷戰史、中美關係史和中國對外關係史等方面的研究及教學；陳之宏的博士論文寫的是 20 世紀 20 年代的中蘇關係，在康奈爾大學教

的主要是中國近現代歷史史料分析及中國商業語言與文化等方面的課程。對我們來說，孔飛力的研究有甚麼意義？我們為甚麼要翻譯他的著述？這恐怕首先是因為翻譯是我們的一種莫名的「嗜好」——陳兼向來的一個習慣，便是對照著中譯本讀英文原著，並不時做各種各樣的批注；陳之宏則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末出國前便為中央編譯局翻譯過不少文獻資料，尤其喜歡翻譯中那種「咬文嚼字」的過程和感覺。再者，這是因為我們覺得孔飛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對於理解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一些基本問題，以及進一步思考各人從自己的角度構建這些問題時的基本的「知識關懷」以及探究這背後的問題意識，實在是太重要了。儘管我們當下從事的研究項目似乎同孔飛力的著述相去甚遠，但從知識和人文關懷的層面來看，尤其是從「後革命」關切的角度來看，我們從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意見同他的很多看法有著相通之處。這一點，在翻譯《起源》一書時顯得尤為明顯。

二

回顧起來，孔飛力作為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內在導向」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關注重點引向了地方及下層。這在他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和《叫魂》這兩本書中十分清晰地表現出來。在《叛亂及其敵對力量》中，他從民兵組織演變以及地方軍事化發展的探討入

手，對於中國帝制晚期農村社會的結構變化作了深入研究，並引導整整一代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歷史時將目光轉向地方層面以及包括下層的社會層面。而在《叫魂》中，他以極為扎實的檔案研究為基礎，首先從「叫魂」作為社會文化現象在基層的表現入手，講述了販夫走卒、鄉愚村婦以及四處游走的貧道乞僧等普通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後的種種經歷，將表面上處於「乾隆盛世」的中國社會景象及其背後潛藏的危機情勢栩栩如生地呈現給讀者。

然而，孔飛力其實並不只是對地方及下層研究感興趣，或認為只有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從來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將「國家」或「全國性問題」當作可有可無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貫穿始終的一個題目，便是政治參與、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以及國家與地方的關係。在《叛亂及其敵對力量》中，他在討論地方軍事化發展及相應的農村基層社會結構變化的同時，也著重分析了國家權力對於下層的滲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紳權擴大而引起的國家—社會關係的蛻變。也可以說，「國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對象——只不過他採納了新的角度。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國帝制晚期的危機所涉及的並非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種文明的沒落」的重要看法。在孔飛力為《叫魂》所構建的大敘事中，「國家」又是關鍵性的角色。他將相當的筆墨放在作為國家的人格化體現的君主及各級官員的描述與探討上；他所試圖揭示的，是由皇權及官僚體制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所透露出來的大清帝國政治體制的運作特點和內在矛盾。而在這一切的背後，還有著

滿清統治者因大一統帝國表述與自身種族意象之間的緊張而揮之不去的「合法性焦慮」。孔飛力確實是中國史研究中將關注點轉向地方及下層的倡導者之一，但與此同時，在他的著述中始終滲透著一種將「中國」當作一個具有多樣性及多元化的整體來看待的「全國性」視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後一章起始時所言：「中國文化是統一的，但不是單一同質的。」

在我們看來，構成孔飛力這一「中國」史觀底蘊的，是他的問題意識和相關的知識關懷。作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孔飛力當然十分注意對於「中國經驗」及其特點的發掘和闡述。但在一個更為深入和基本的層面，這其實並不是他研究中國歷史時知識關懷的真正歸宿之所在；他所關注的，還在於發掘「中國經驗」特殊性之中所包涵的同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及其內在邏輯相通的普世性價值和意義。這不僅蘊含著世界對於中國「現代性」構建的影響問題，也涉及到了中國的經驗和經歷對於世界範圍現代性構建——亦即作為普世性進程的現代性構建——的意義和影響問題。在這一點上，孔飛力和他的老師史華慈極為相似：他們的「問題意識」中有著對於人類命運的關切、憂慮和思索。

在孔飛力的所有著述中，都涉及到了「現代性構建及其後果」這一構成 20 世紀人類經驗及歷史走向的中心問題。從《叛亂及其敵對力量》到《叫魂》（也包括他做了多年，但最終沒有成書的關於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中葉中國地方自治發展的研究），孔飛力以「中國經驗」為「實驗室」而孜孜探求的一個問題，是作為現代性構建重要環節的各具特徵的「現代

國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說，這同他對「現代國家」特質以及「現代性」的界定是有關的。在孔飛力看來，這不僅關係到了中國，也是一個帶有普世性意義的問題。他認為，「『現代性』有著多種形式的存在，也有著各種替代性選擇」；「不同的國家是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走向『現代』的」。這是一種對於西方經驗可以壟斷「現代性」界定的否定。與此同時，從他的問題意識的邏輯出發，他又認為，任何具有普世性質的問題必定會在所涉及的個案中（不管這些個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層面以其本身內在的、而不是外部強加的方式被提出來。因此，在現代國家構建的問題上，比之來自外部世界的影響，植根於本土環境及相應的知識資源的「內部動力」要帶有更為根本的性質——歸根結蒂，外部世界的影響也是要通過這種內部動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他提出，現代性構建的「內部」史觀和「外部」史觀在方法論上是可以統一起來的。

於是，孔飛力關於現代性構建的上述問題意識，越來越將他引向一些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過程中超越了危機、革命、戰爭及政權變動而在國家建制的層面一再表現出來的長時段的歷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同包括憲政民主在內的現代性構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並會在歷史演進的各個時期不斷表現出來。這為他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將「現代國家」形成當作中心論題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筆。

孔飛力所必須應對的挑戰是，他需要說明，深植於中國

歷史文化之中並與現代性並不相悖的種種知識資源，是在怎樣的歷史環境下，通過怎樣的具體歷史途徑，或者說，經過何種人的努力或作為，而導致了向著現代性以及具有中國特質的「現代國家」漸次轉變的具體歷史進程的？這是否能夠在經驗事實和相關歷史敘述的層面獲得說明？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請孔飛力到法蘭西學院發表系列演講，這為他提供了機會，促使他清理自己的思路，把自己關於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與現代性構建關係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來，並作較為系統的表述。

在集中探討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問題時，孔飛力將討論的重點集中到關係到「現代國家」形成的「根本性問題」及與之相關聯的「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上來。在這裏，他使用了constitutional這個詞——在演講中，孔飛力開宗明義便提出，自己所要討論的，是關於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關的「constitutional agenda」。孔飛力對此的定義是：「所謂『根本性』問題，指的是當時人們關於為公共生活帶來合法性秩序的種種考慮；所謂『議程』，指的是人們在行動中把握這些考慮的意願。」

這就使得我們遇到了如何翻譯constitutional這一基本詞語的問題。對此，我們頗費躊躇。一種簡單的做法，是將「constitutional question」和「constitutional agenda」這兩個概念譯為「憲政問題」和「憲政議程」。如果從constitutional這一詞語的起源及其演變及使用來看，它確實同「憲法」及「憲政」有關，並以之為核心；實際上，孔飛力在一系列著作的寫作